

话说金瓶梅



张国风 著

风花雪月浮世绘 酒色财气皆世情
诲淫之罪谁与析 落叶满地说金瓶

张国风 著

话说金瓶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说金瓶梅/张国风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633 - 6928 - 7

I. 话… II. 张…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I207. 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68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6.75 字数:124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9.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金瓶梅詞話序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
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七
情憂鬱爲甚上智之士與化俱
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
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爲

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



金瓶梅序

金瓶梅穢書也袁石公亟稱之亦自
寄其牢騷耳非有取於金瓶梅也然
作者亦自有意蓋為世戒非為世勸
也如諸婦多矣而獨以潘金蓮李瓶
兒春梅命名者亦楚檣杌之意也蓋
金蓮以姦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

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



告别传奇	1
『海淫』之罪	6
回避和『遗忘』	17
酒色财气	21
人心最歹	35
万恶淫为首	41
富而多诈	59
判若两人	88
无争无竞	102
三教九流	109
享乐与消遣	127
心照不宣	134
惧内和好妒	141
主线和副线	147

目录

风吹云散	153
小说与算命	161
生育的安排	166
配角的利用率	172
插科打诨	178
讽刺与暴露	182
重复自己	186
文龙的怪论	192
方法论的启示	196

告别传奇

我首先注意的，是《金瓶梅》的特点。或者说，首先引起我的兴趣的，是《金瓶梅》与其他古典小说不同的地方。

人们早就注意到，《金瓶梅》没有写英雄。严格地说，《金瓶梅》只写了一位英雄，那就是武松。武松是兰陵笑笑生从《水浒传》嫁接过来的人物。武松不是《金瓶梅》企图加以描写的人物。武松在《金瓶梅》里的主要作用就是引出西门庆和潘金莲的世俗的故事。《金瓶梅》要表现、描写的，是普通的市井人物。

诚然，描写普通的市井人物，并不是从《金瓶梅》开始的。《水浒传》里所描写的，也不都是英雄。所谓一百零八将，半数以上不给人多少印象。恰恰相反，《水浒传》中颇有一些写得很成功的普通市井人物。例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店小二、董超、薛霸、差拨，“王婆贪贿说风情”中的西门庆、潘金莲、王婆、郓哥、何九、武大郎，“汴京城杨志卖刀”中的泼皮牛二，“宋江怒杀阎婆惜”中的阎婆母女。可是，这些普通的市井人物都只是英雄的陪衬。他（她）们不是作者要表现的主要对象。这些陪衬人物为英雄人物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环境，一个舞台，为英雄人物轰轰烈烈的业绩提供了一个背景。英雄的故事夺去了读者几乎全部的注意力。

人们或许会想到，在宋元话本中，普通的市井人物已经在某些作品

中作为主角来描写。例如《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崔待诏生死冤家》、《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可是,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话本和《金瓶梅》有很大的差别。宋元话本中的那些普通的市井人物,都被组织在离奇的故事之中,而《金瓶梅》却不是这样。《金瓶梅》所描写的,只是普通市井人物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在这里,人物是平凡的,故事也是平凡的。人物和故事同时高度地逼近生活,与传奇告别。中国的古代小说,大多习惯于从神话、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中汲取素材,而不太习惯于从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去寻觅素材。一直到清代,这种情况也没有根本的转变。长篇小说则尤其如此。著名的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平妖传》,都是这样。中国古代小说对离奇情节的追求,是一个更为悠久、更为顽强的传统。从神话、史传文学、六朝志怪、唐传奇,一直到《三国》、《水浒》、《西游》,以及同是描写世俗人物的那些宋元话本以及明人的拟话本,都可以意识到这一传统的强劲有力。这种小说创作传统培养了嗜好离奇情节的读者,而嗜好离奇情节的读者又反作用于文学的创作,迫使作家不敢轻易地偏离传统的轨道。从人物的非英雄化、素材的当代化、情节的非传奇化这三个方面看,《金瓶梅》的创作具有很大的探索意义。这种探索影响深远,为宋元以后兴起的白话小说、通俗小说的发展展现出广阔的前景。兰陵笑笑生或许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与观察使我们得出这一结论。《金瓶梅》的探索确立了它在中国小说史这个巨大的坐标系中的重要位置。

人们早就注意到,《金瓶梅》没有写光明。兰陵笑笑生所勾勒的,是一个没有光明、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前途的社会。无可救药的人物、无可救药的社会,《金瓶梅》给读者的整体印象就是这样。《金瓶梅》前后的小说也有暴露黑暗的,但往往也还要同时写到光明,写到善与恶的斗争。可是,《金瓶梅》却不写光明、不写善,而是注重写恶、写丑。《金瓶梅》选择了市井人物中最恶劣的成分——市侩来作主角。西门庆



和潘金莲都是典型的市侩。不仅如此,《金瓶梅》在处理书中的绝大多数人物形象的时候,都体现了一种尖刻冷峻的态度。兰陵笑笑生有意识地努力发掘人物心中的“丑”与“恶”。历来的小说受儒家思想的支配,离不开善与恶的对立这一模式。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模式。《三国演义》中刘备集团和曹魏集团的斗争,《水浒传》中绿林好汉与贪官污吏的斗争,《西游记》中孙悟空与妖魔的斗争,都是善与恶的对立。小说家依据这一模式来塑造人物、设计布局。放弃善恶对立的模式,不仅是一种创作的选择,而且是一种人生观、世界观的选择。兰陵笑笑生的选择深刻地反映出他对人性、对社会的看法。

谁也不能否认,《金瓶梅》书中大量的淫秽描写是糟粕。谁也不能否认,《金瓶梅》全本不适宜在大众中流行,尤其是不适宜在青少年中流行。

有人曾经设想,删去那些淫秽的描写,就可以避免《金瓶梅》“坏人心术”的消极作用,而保存它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金瓶梅》中的淫秽描写是一把双刃的剑。这类描写固然有它消极的诱导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作者借以刻画人物思想性格、揭示人物灵魂的一种手段。这是《金瓶梅》和现代所称黄色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删去那些淫秽的描写,《金瓶梅》会显得干净一些。可是,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陈经济、王六儿、宋惠莲等一系列人物思想性格的刻画,都会有所削弱,人物与人物之间思想性格的差异也会随之模糊起来。从这一点上来说,与其把《金瓶梅》称作古代黄色小说的代表,莫如把它称为古代性文学的代表。一个人对性问题的看法与处理方式,深刻地反映出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思想性格,反映出他对人生的看法。而《金瓶梅》这样一部描绘家庭、描绘世俗人生,努力发掘“丑”与“恶”的长篇小说,是如此地借重性的描绘,我们又怎能把它和一般的黄色小说混为一谈呢!

兰陵笑笑生在闯入新的题材的时候,在他的目光向着普通市井人

物的日常生活寻觅的时候，一下子面临中国小说史上的三个历史性的课题（人物的“非英雄化”、素材的“当代化”和情节的“非传奇化”）和一个既成的模式（善与恶的对立）。应该说，他的文学尝试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金瓶梅》自有其重大的缺陷。但是，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无可怀疑的。兰陵笑笑生在解决三个历史性课题和打破一个固定模式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出现了很多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失误。大量的淫秽描写，一些不必要的性描写穿插，场面的繁琐重复，描写的臃肿、冗长，某些人物思想性格的模糊，前后不一，发展不自然，情节的前后抵牾，都是明显的缺陷。

兰陵笑笑生之所以能够进行大胆的探索，是因为他恰好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时代。所谓“宽松”指的是明朝中后期文化界的情形。从杨慎、吴承恩、李开先、徐渭、李贽、屠隆、汤显祖、袁宏道、钟惺、冯梦龙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这种“松动”和“宽松”。尽管他们在整体上未能冲破儒家思想的传统藩篱，但他们在很多局部的问题上却有离经叛道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很多抵触之处。儒家讲文以载道，而《金瓶梅》却很难和“道”联系起来。满文译本《金瓶梅》的序便不客气地指责《金瓶梅》“每回无过结交朋党、钻营勾串、流连会饮、淫黷通奸、贪婪索取、强横欺凌、巧计诓骗、忿怒行凶、作乐无休、讹赖诬害、挑唆离间而已，其于修身齐家、裨益于国之事一无所有”。儒家历来厚古薄今，而《金瓶梅》却摒弃了取材历史、取材典故的传统。儒家宣扬英雄史观，而《金瓶梅》却偏偏没有兴趣写英雄。儒家讲“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金瓶梅》却展开了性的描写。儒家思孟学派讲人之初，性本善，《金瓶梅》却大力发掘人性的“恶”。在兰陵笑笑生描绘的世俗人间里，没有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没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处世态度，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叹息也没有。人们在《金瓶梅》里看到的，是对于酒色财气的



追逐；能够听到的，是津津乐道的、小市民的处世哲学。

从文学的传统来说，《金瓶梅》对人性的“丑”与“恶”的发掘，固然有其偏激的一面；但是，这种发掘对于那种“瞒和骗”的传统却是一个有力的反拨。人们可以责备兰陵笑笑生没有写光明，责备《金瓶梅》的描绘“沉闷窒息、漆黑一团”，可以责备兰陵笑笑生对黑暗与腐败没有鲜明的憎恶，没能施以有力的鞭挞，可以批评兰陵笑笑生对西门庆纵欲无度的放荡生活有那么几分艳羡之情。但是，人们不能说《金瓶梅》对人物、对社会的描写不真实。《金瓶梅》对人物、对社会的阴暗面的暴露，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小说，包括象《水浒传》那样杰出的作品。其真实和深刻的程度，在以后的古代小说中，也是罕有伦比的。私有制产生以后，人类的贪欲就一直作为一种邪恶的力量，推动着或破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贪欲早在先秦的法家那儿，就已经得到了尖锐的剖析和冷峻的总结，性恶论就是这种剖析和总结的成果。在中国的小说史上，这种贪欲一般只是附着在反面人物的灵魂之中。到了兰陵笑笑生的笔下，这种贪欲才得到了如此充分、不加粉饰的、正面的描写。兰陵笑笑生把这种贪欲几乎赋予了《金瓶梅》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到了清朝吴敬梓的讽刺巨著《儒林外史》，又把这种贪欲的描写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

《金瓶梅》是作家的独立创作，还是犹如《三国》、《水浒》、《西游》那种世代累积型的作品？与此相联系，《金瓶梅》的作者或写定者究竟是谁？这两个问题，本书都无力涉及。本书要涉及的，主要是作品本身，它的主题、人物、布局等，旁及前人的评点。回到原著那儿去，这就是本书的宗旨。实事求是、公正地对待原著，不以个人的先入之见去作品中寻觅“证据”，不用寻章摘句、裁剪原著的真实去证明某种现成的理论或观点，这就是这一宗旨的含义。至于实行这一宗旨的得失成败如何，那就要靠读者来裁决了。

“诲淫”之罪

《金瓶梅》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被人目为淫书。其实,《金瓶梅》在写作过程中就已经被它的作者或写定者自己目为淫书。写作者之所以那么小心翼翼地藏起他的姓名,这是一个重要原因。《金瓶梅》的作者为后代的研究者留下了“兰陵笑笑生”这样一道谜,让他们绞尽脑汁、呕心沥血。虽然二十年前已经有人声称,《金瓶梅》的作者已经呼之欲出,但结果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千呼万唤“不”出来。有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金瓶梅》的作者,但毕竟还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

《金瓶梅》之被人目为淫书,那是与其写法有关的。光是看看它的部分回目,就不难看到,兰陵笑笑生是如何乐此不疲地在围绕性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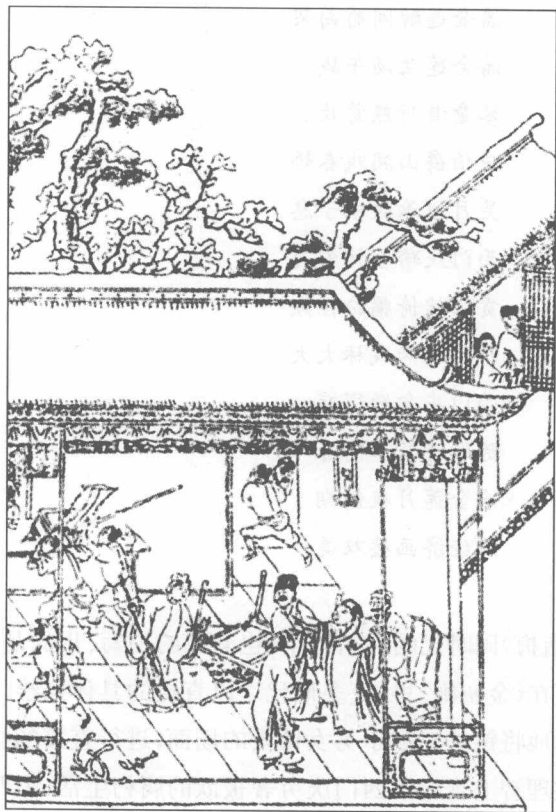
西门庆茶房戏金莲

淫妇背武大偷奸

烧夫灵和尚听淫声

潘金莲私仆受辱

李瓶儿隔墙密约



西门庆大闹丽春园

迎春女窥隙偷光

李瓶儿送奸赴会

西门庆私淫来旺妇

玉箫观风赛月房

金莲窃听藏春坞

经济元夜戏娇姿

雪娥透露蜂蝶情

潘金莲醉闹葡萄架
潘金莲兰汤午战
琴童潜听燕莺欢
应伯爵山洞戏春娇
吴月娘承欢求子息
西门庆踏雪访爱月
贲四嫂倚牖盼佳期
西门庆两战林太太
西门庆贪欲得病
陈经济窃玉偷香
潘金莲月夜偷期
陈经济画楼双美

与《金瓶梅》同时代的“三言”中,也有性的描写,用的是比喻、间接的暗示。而在《金瓶梅》里,更多地代之以直接的具体描绘。作者常常是无所顾忌地将镜头对准了男女做爱的场面,进行直接的拍摄。看来尽管作者在理智上否定了西门庆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为西门庆安排了贪欲身亡、姬妾去散、家道衰歇的结局,但是,我们从作者津津有味、不厌其详的性描写中可以看到,作者在感情上对西门庆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不无欣赏之情。

如前所说,《金瓶梅》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被人目为淫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金瓶梅》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有人为它的性描写辩护。文学史不仅仅是研究作者和作品的学问,而且也是研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读者如何接受、理解、欣赏作者和作品的学问。在探讨《金瓶梅》的“诲淫之罪”以前,我们浏览一下前人、尤其是“兰陵笑笑生”的同时代人为它的性描写所作的辩护,可能是不无益处的。



《金瓶梅》里的人物栩栩如生,描写的社会生活是那么逼真;可是,这部小说里又插进了那么多放肆的性描写。为了肯定《金瓶梅》的价值,人们认为有必要为《金瓶梅》的性描写作一点辩护。文人学子最尊崇、最熟悉的,莫过于儒家的经典。儒家的经典也真是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人们毫不费力就从里面找到了立论的根据。这便是“关雎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先师不删郑、卫之旨”。既然孔夫子当年编纂《诗经》的时候没有删去那些抒写男女恋情的民歌,还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之类的话,那么,《金瓶梅》里有一点性的描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这种逻辑在现代人看来是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可是,在言必称孔孟的文人学子那里是毫不奇怪的。时代已经到了明代,当时文人学子所理解的孔孟也已经不是历史上的真实的孔孟,而已经是经过了禁欲主义洗礼的孔孟。在当时的文人学子那里,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恋爱”这回事。男性与女性之间,要么是夫妻关系,要么是私情关系,要么是没有关系。直到今天,所谓“男女关系”,仍然特指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这就是那种旧意识在语言上留下的痕迹,只是人们不注意罢了。所以,在当时的文人学子那里,在正统思想发挥作用的地方,恋爱是一个怪物,是一种淫秽的、见不得人的东西,这就难怪他们要把《诗经》中的爱情民歌,比作《金瓶梅》中淫秽的描写了。在他们看来,两者是同样的肮脏、同样的见不得人,既然孔夫子能容忍《郑风》、《卫风》,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容忍《金瓶梅》呢?孔孟总是不会错的,谁敢怀疑圣人呢?凡是正确的东西,必定可以在圣人的言行中找到根据。“天不变,道亦不变”,圣人已经发现并穷尽了真理,后人的任务只是阐发和理解这些真理。所以,从孔孟的著作中寻找一切问题的答案,成为文人学子的一种思维定式。在他们考虑如何为《金瓶梅》辩护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便是“先师不删郑、卫之旨”。可是,《金瓶梅》中赤裸裸的性描写,毕竟不能与《诗经》中对爱情的大胆表白(如“子不我思,岂无

他人”之类)相提并论。于是,有人想到了“食色,性也”之类的古训。宋元以后,《孟子》中的这句话已经很少被人引用了,因为儒家学说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掺入了越来越多的专制主义、禁欲主义、信仰主义的成分。“食色,性也”之类的古训,已经不大符合统治者的口味,也就不大宣传了。谈《金瓶梅》而提起“食色,性也”,是用性欲是人的一种本能来为《金瓶梅》的性描写作辩解。比起“先师不删郑、卫之旨”来说,是进了一步。“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欣欣子《金瓶梅词语序》),这就是“食色,性也”这句古训的注释与发挥。这种辩解已经颇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按照儒家的观点,人之所以成为人,换句话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也只在于人有伦理道德。人要是没有伦理道德,那就与动物没有区别。而食与色,正是人与动物相混淆的两个领域。当然,即便是在这两个领域,人也与动物有根本的区别。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人永远也不能彻底地与动物划清界限,也在这两个领域。何况,《金瓶梅》里的色欲,没有多少感情的成分,而常常只是一种肉欲。所以,用“食色,性也”来为《金瓶梅》作辩解,也是经不起推敲的。于是,有人想到了更加彻底的辩解理由,这便是“东吴弄珠客”的《金瓶梅序》中的一段话:

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
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也。

这种论点,不能说没有一点合理的成分。同样的一部书,在不同的读者那儿,是会产生不同的感受。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由于各自的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习惯和取向不同,会对同一部文学作品产生很不相同的感受。东吴弄珠客把读者从高到低分成菩萨、君子、小人、禽兽四个层次,他们的感受与反应也相应地分成怜悯、畏惧、欢喜、效法